

推動國共第一次合作

一、贊同以俄為師

一九一一年前，孫中山領導和組織過十一次武裝起義；辛亥革命後，又領導和發動了反袁、反段的護國及「護法」運動。這些革命鬥爭，推翻了清王朝，埋葬了在中國綿延兩千多年的封建專制制度，打擊了北洋軍閥的反動統治。但是，中國的半殖民地半封建社會並沒有改變，從革命目標和任務上看，「革命尚未成功」。整個中國仍然是被帝國主義欺壓和封建軍閥蹂躪的土地。真是「長夜難明赤縣天」。

宋慶齡參加了反袁及護法的鬥爭，與孫中山一起分享過一時勝利的喜悅，也共嘗了屢次失敗的苦果——特別是陳炯明叛變，幾乎危及他們的生命。他們深深地陷於徬徨與苦悶之中。

宋慶齡回憶當時孫中山的心情時說：他「痛苦地認識到國民黨的嚴重局限性。我曾多次聽他說國民黨內部矛盾怎樣使他不能有效地進行革命。國民黨中不真心想在中國進行徹底的社會改革的黨員太多了……怎樣領導革命鬥爭，這是他想得越來越多的問題」。75 宋慶齡對孫

75 宋慶齡：《孫中山和他同中國共產黨的合作》，載《人民日報》一九六二年十一月十二日。

中山的這種心情，表示深切的理解和同情，並熱誠地與他一起總結經驗教訓，探尋革命的新出路。

正在這個時期，中國和世界上都發生了驚天動地的事件，改變著歷史的進程：一九一七年，俄國取得了十月社會主義革命的勝利；一九一九年，中國爆發了五四運動；一九二一年，中國共產黨成立。

「山重水複疑無路，柳暗花明又一村。」這些改變中國人民和世界人民前進方向的重大事件，也把孫中山和宋慶齡從舊民主主義的窮途末路引到了新民主主義的陽關大道上來；以俄為師，改組國民黨，與共產黨合作共同進行革命。當孫中山晚年放射出燦爛光輝之時，宋慶齡猶如一顆碩大的衛星緊緊追隨著他，並且有力地幫助孫中山完成了這個偉大的轉折。

大江東去，浪淘盡，千古風流人物。在一八四〇年鴉片戰爭後的近代中國百年革命鬥爭的激流中，千迴百轉，多少英雄豪傑沉浮反覆，一個革命者能善始善終、不被淘汰是極難的，而一直處在弄潮兒的地位上，甚至處在領袖地位上，就更是罕見了。孫中山則是這樣的偉人。宋慶齡與孫中山一起度過了這一段在驚濤駭浪中力挽狂瀾、奮勇前進的歲月，所以她深深體會到這種奮鬥的艱辛與偉大。她說：「在十月革命的影響和中國共產黨的推動下，孫中山開始覺悟到建立革命武裝的重要性，並逐步形成『非以俄為師斷無成就』的思想，確立了『聯俄、

容共、扶助農工」的三大政策。一個人能夠隨著時代發展不斷前進可不容易呵！」⁷⁶

追本溯源，孫中山晚年的進步是得之於列寧最大的推動。列寧是世界無產階級的革命導師，他在從事革命活動的早期，就非常注意中國的局勢，從一九〇〇年起，特別是一九一二和一九一三年，他連續撰寫了多篇重要文章，評述孫中山和他領導的革命運動。而且，他是世界上最早注意到辛亥革命國際意義的人。他在著名的《中國的民主主義和民粹主義》一文中，針對當時取得了辛亥革命勝利而任職中華民國臨時大總統的孫中山及其在《中國革命的社會意義》一文中提出的綱領，作了歷史的、階級的分析，給予了崇高的讚譽和評價：「孫中山綱領的每一行都滲透了戰鬥的、真誠的民主主義。它充分認識到『種族』革命的不足……它直接提出群眾生活狀況及群眾鬥爭問題，熱烈地同情被剝削勞動者，相信他們是正義的和有力量的。」

在把孫中山與「歐美各先進文明國家的共和國總統比較」後，列寧稱讚孫中山是「充滿著崇高精神和英雄氣概的民主主義者」。他說：「這種精神和氣概是這樣一個階級所固有的：這個階級不是在衰弱下去，而是在向上發展；它不是懼怕未來，而是相信未來，奮不顧身地為未來而鬥爭；它憎恨過去，善於拋棄死去了的和窒息一切生命的腐朽東西，決不為了維護自己的特權而硬要保存和恢復過去的東西。」⁷⁷

76 宋慶齡與吳玉章的談話（一九六一年四月），轉引自《團結報》一九八六年五月二十四日。

77 《列寧選集》第二卷，第四百二十四、四百二十五頁，人民出版社一九七二年十月版。

列寧這裡闡述的東方資產階級革命性的見解，成了他一九二〇年起草並為共產國際第二次代表大會通過的《民族和殖民地提綱》的基礎。作為馬克思主義發展到列寧主義的一個重要標誌，列寧把國際無產階級革命與被壓迫民族的解放運動聯繫了起來，即把馬克思的「全世界無產者聯合起來」，發展成「全世界無產者和被壓迫民族聯合起來」。他從孫中山的身上找到了有力的佐證。這也是他晚年與孫中山合作，並且推動孫中山與共產黨合作，發展中國革命的思想基礎。

同時，列寧也深刻地分析了孫中山綱領中的矛盾，指出它是「純粹資本主義的、十足資本主義的」，卻要「使中國避免走資本主義道路」，這是「社會主義空想」、「主觀社會主義」。不過，列寧在準確地預言，袁世凱將出賣革命後，又準確地預言了孫中山不管會遭到怎樣的失敗，一定會繼續革命。更令人欽佩的是，列寧還英明地預言，將來中國無產階級的政黨在批判孫中山的錯誤觀點時，「一定會細心地辨別、保存和發展他的政治綱領和土地綱領的革命民主主義內核」。⁷⁸

這裡，列寧實際上指明了將來國共合作的思想基礎。

從這些文章中，可以看到，列寧與孫中山在十月革命前雖然素不相識，天涯相隔，但思想卻是相通的。

孫中山一心拯救祖國，但並不是一個狹隘的民族主義者，他同時熱情地關注著被壓迫民族的解放事業，「考慮的是整個世界」，⁷⁹特別對俄國革命表示深切同情。因此，正如宋慶齡所說，「孫中山很早就同情俄國革命，並且密切地注視著它的進展。他在聽到俄國革命成功消息時高興到了極點」，⁸⁰立即產生了「想同列寧直接聯繫，交流革命經驗」⁸¹的想法，爭取列寧對中國革命的幫助。因此，在一九一八年春，他在廣州給列寧拍去一個電報，⁸²祝賀十月革命的勝利，指出「俄國革命和中國革命目標相同」，「願中俄兩黨團結，共同鬥爭」。⁸³據鄒魯回憶：「時各國正嫉惡蘇俄，列寧得總理（孫中山）電，大為感動，視為東方之光明。」⁸⁴因為十月革命勝利後，英、法、美、日等帝國主義國家對蘇維埃政權極端敵視，不但拒絕承認新政府，還支持蘇俄國內反革命勢力發動了一系列暴亂，並且開始進行公開的武裝干涉，包圍蘇俄，妄圖立即把新生的紅色政權扼殺在搖籃中。所以，孫中山給列寧的賀電，無疑對蘇維埃政府是道義上的極大支持，是難能可貴的。列寧在接電後的興奮心情可想而知。他立

79 宋慶齡對孫中山的評語，轉引自（美）埃德加·斯诺：《復始之旅》第一百二十二頁，新華出版社一九八四年版。

80 宋慶齡：《十月社會主義革命和中國革命的歷史聯繫》，載《人民日報》一九五六年十一月八日。

81 宋慶齡：《孫中山和他同中國共產黨的合作》，載《人民日報》一九六二年十一月十二日。

82 孫中山給列寧的第一個電報，有的說是一九一八年夏或秋在上海拍發的，但根據這年八月一日蘇俄外交人民委員齊契林的覆信看，應該是這年春天在廣州拍發的。

83 參見《孫中山的一個未公布的檔》，載蘇聯《布爾什維克》雜誌，一九五〇年第十九期。

84 鄒魯：《中國國民黨史稿》，第三百四十二頁。

即作出積極的反應，八月一日，委託蘇俄外交人民委員齊契林覆函孫中山。覆函首先說明由於國內叛亂和帝國主義侵略，使他們與孫中山的聯繫被切斷了幾個月，所以未能及時答覆。列寧讚賞孫中山的革命功績和認為俄國革命與中國革命「目標相同」的觀點，指出兩國革命「正遇到一些空前未有的困難」，呼籲共同鬥爭，互相支援。⁸⁵

孫中山的賀電引起了列寧和蘇俄政府的重視，雙方的聯繫終於建立起來了，從此，孫中山在上海，在廣州，與列寧多次函電往返。

在十月革命勝利之初，孫中山與列寧和蘇俄的這種聯繫是絕對保密的，他們之間討論中國和世界革命問題的函電，孫中山方面由宋慶齡和廖仲愷、朱執信起草，其中大量的工作主要要由機要秘書宋慶齡來承擔。宋慶齡為便於處理他們間的大多數來往電函，起草孫中山為數甚多的電文，還專門學習了俄文。她說：「在通信往來當中，這兩位偉大的革命戰士在爭取人類自由和進步的鬥爭中攜起了手來，可惜的是，這些信件在那年六月陳炯明廣州叛亂中火燒總統府的時候被焚毀了。」⁸⁶

宋慶齡後來曾回憶在那些日子裡，她和孫中山一起與列寧聯繫，一起研究俄國革命，希望從中找出可供中國革命借鑒的經驗來的生動情景。她說：孫中山堅信俄國革命的勝利「必

85 蘇聯《國際生活》一九五七年第十一期。

86 宋慶齡：《十月社會主義革命和中國革命的歷史聯繫》，載《人民日報》一九五六年十一月八日。

定會在中國產生「反響」，它「為中國樹立了一國如何擺脫外國侵略與枷鎖的榜樣」。⁸⁷孫中山多次向宋慶齡表示：一個民族要獲得解放，必須效法列寧和布爾什維克黨領導下的俄國人民的榜樣；這就是說，必須明確地堅定不移地牢記他們的革命的前景和目標，必須使人民群眾認清他們的主要敵人——帝國主義和反動派，認清他們的本質、特點和手法。並在這種高度的政治覺悟的基礎上組織人民展開堅決的鬥爭。⁸⁹

一九二〇年秋，孫中山在上海寓所的書房裡，終於接見了列寧領導的共產國際派來的第一位使者——維金斯基（Войтинский）。維金斯基是共產國際遠東局負責人，奉派前來同中國革命組織建立聯繫，幫助成立中國共產黨。他在與北京的李大釗和上海的陳獨秀就建立共產黨進行了一系列商談後，接受陳獨秀的建議到莫里哀路二十九號拜會孫中山。在孫中山的書房中雙方就蘇俄與孫中山建立關係問題初步交換了意見。宋慶齡陪同接見，她給維金斯基留下了深刻的印象。⁹⁰

一九二一年八月，孫中山在廣州終於接到來自蘇俄的第一封信後，立即覆信給蘇俄外交人民委員齊契林。信中敘述了辛亥革命及其後的歷程，總結了經驗教訓，剖析了北京政府的

87 宋慶齡：《十月社會主義革命和中國革命的歷史聯繫》，載《人民日報》一九五六年十一月八日。

88 一九二四年九月英文《廣州日報》發表的孫中山訪問記。

89 參見宋慶齡：《孫中山和他同中國共產黨的合作》，一九六二年十一月十二日《人民日報》。

90 參見維金斯基：《我與孫中山的兩次會見》，載《維金斯基在中國的有關資料》，中國社會科學出版社一九八二年版。

反動性質，滿腔熱情地希望同這個新興的社會主義國家取得聯繫，以便瞭解它在政治、軍事、教育等方面的經驗。他懇切地說：「我希望與您及莫斯科的其他友人獲得私人的接觸。我非常注意你們的事業，特別是你們蘇維埃的組織、你們軍隊和教育的組織。」信中還提出了今後通信聯繫的意見，並向「我的朋友列寧以及所有為了人類自由事業而有許多成就的友人們致敬」。⁹¹

與此同時，列寧和共產國際又連續派出馬林（Maring）、С·А·達林、越飛（А.А. Иоффе）、鮑羅廷（М. Бородин）等人來中國，在幫助中國的無產階級建立中國共產黨組織的同時，說明孫中山解脫困境，推動國民黨改組並與共產黨合作的。

一九二一年，馬林（蘇俄民族與殖民地委員會的秘書）作為共產國際的代表來華，在頭年維金斯基工作的基礎上，促進召開中國共產黨第一次全國代表大會，幫助成立了中國共產黨。之後，他在促使共產國際作出國共合作的決定，並說服中國共產黨執行這個決定的同時，開展做孫中山的工作。在一九二一年十二月下旬，馬林由張春木（後更名太雷）陪同，作為孫中山的客人在桂林住了三天。

當時，正值宋慶齡率領紅十字會員們在桂林進行支援北伐的工作，於是她便陪同孫中山一起接待馬林和張太雷，長談了三次。交談中，馬林向孫中山提出關於中國革命問題的兩項

91 《覆蘇俄外交人民委員齊契林書》，載《孫中山全集》第五卷，第五百九十三頁，中華書局一九八五年四月版。

重要建議：組織一個能聯合各階層尤其是工農群眾的政黨；建立革命武裝的核心，應先創辦軍官學校以培養革命骨幹。此外，馬林還強調了國民黨進行群眾運動和在工人階級中進行宣傳的必要性。⁹²孫中山十分贊同這些建議。

當時，帝國主義國家（特別是英國）通過香港當局密切注視著孫中山的動向，派軍方情報人員竭力搜集情報，所以孫中山與馬林的會談極端保密。宋慶齡說：「討論材料，孫先生派人送交廖仲愷先生，囑他看後即燒掉。但廖先生看後放在他財政部保險箱內，被陳炯明打進時拿到後就發表了。以為是孫中山賣國材料，發表登在各報……按照我的記憶所及，每個字印得有酒杯那麼大，登在上海各報。那天早晨，我是第一個發現這類報紙的人，當即拿給孫先生看，他和汪精衛正在圖書室裡（孫先生已離開永豐艦在上海了）。」⁹³所以，後來孫中山與越飛的會談結果也就登報了，但從當時的客觀情況看，已無所謂什麼秘密了。

一九二二年，共產國際派遠東局書記處成員之一C·A·達林作為共產國際全權代表來華，幫助中國成立社會主義青年團，並推動國共兩黨的合作。他在這年四月至六月，在孫中山移師韶關北伐及與陳炯明的背叛行為鬥爭的日子裡，多次秘密拜訪孫中山。宋慶齡陪同孫

92 《馬林給共產國際執委會的報告》（一九二二年七月十一日）和伊羅生的《奧斯內夫利特談話記錄》，均載《馬林在中國的有關資料》，人民出版社一九八一年版。

93 宋慶齡一九八〇年二月二十三日覆高明軒函，原件。

中山接見他。 94

當時孫中山正在與美國進行秘密談判，請求貸款，以解決軍政府財政上的燃眉之急。孫中山與宋慶齡一樣，對美國的「民主」留有良好的印象，對美援寄予幻想。為此，孫中山甚至答應美國人提出在廣州政府中聘請美國顧問的要求。但是，由於英國支援陳炯明叛變，美國則樂意看到廣州政府被顛覆，他們欺騙了孫中山，沒有給他一點援助。因此，孫中山在平叛失敗被迫離開廣州後，思想有了急劇的轉變；對西方完全失望，把希望轉向蘇俄。

孫中山告訴達林：「在這些日子裡，我對中國革命的命運想了很多，我對從前所信仰的一切幾乎都失望了。而現在我深信，中國革命的唯一實際的真誠的朋友是蘇俄。」在達林回國時，他又請達林轉信給蘇俄外交人民委員齊契林，表示了雖然再次失敗，也不會停止鬥爭的決心，再次向列寧轉致友善之情，呼籲支援。

列寧並不因為孫中山遭到了空前嚴重的失敗而拋棄他，而是作出了積極的回應。與蘇聯結盟，孫中山終於找到了絕處逢生的唯一出路。與此同時，中國共產黨的總書記陳獨秀也在上海與國民黨領導人張繼會談，表示堅決支持孫中山。

疾風知勁草，患難識知己。正像十月革命後孤立的蘇維埃政權得到孫中山和中國人民珍貴的支援一樣，孫中山和宋慶齡也找到了真正的、經得起嚴重考驗的朋友。

列寧根據馬林的提議，派出越飛作為蘇俄第一個公開的、正式的特命全權大使，在一九二二年秋季赴華。越飛到達中國後，由於帝國主義把當時的蘇俄視為「洪水猛獸」，既恨又怕，因此北京政府拒絕以外交禮節接待越飛。

孫中山在宋慶齡陪同下，先與越飛代表會晤，就「遠東大局問題

及解決方法」⁹⁵進行商談。接著，為避開帝國主義反動派的耳目，孫中山又派廖仲愷代表他到日本與越飛繼續會談。之後，孫中山和宋慶齡又於一九二三年一月中旬在上海寓所熱情地接待越飛，雙方舉行了多次會談，就改組國民黨與建立軍隊，以及蘇聯與共產國際援助中國革命和反對帝國主義等問題，達成了一些原則意見。一月二十六日，他們發表了著名的《孫文越飛聯合宣言》。⁹⁶

宣言中寫道，「中山以為共產主義及蘇維埃制度均不能實施於中國……越飛對於此項意見



一九二二年，孫中山、宋慶齡在上海住所前留影。

95 胡漢民編：《總理全集》第四集，「遺墨」第二輯，載《致蔣介石石鏡共二十件》，第一百七十七—一百八十頁。

96 《孫中山全集》第七卷，第五十一、五十二頁，中華書局一九八五年十月版。

完全贊同，並以為中國之最重要最急迫問題，為完成全國統一，並取得完全之國家獨立。關於此項大業，越飛向中山保證：俄國人民對於中國表最熱切之同情，並願予以贊助」。

宣言的真正價值，在於明文確定了孫中山聯俄政策的基礎，宣佈與第一個社會主義國家建立實際的聯繫，和接受了國際革命勢力的援助，它意味著孫中山丟掉對帝國主義的幻想後一個偉大轉折的開始，從而將完全改變中國歷史發展的方向。至於宣言中說「共產主義及蘇維埃制度均不能實施於中國」，一是出於孫中山當時的認識水準，二是由於當時中國國內外政治環境而採用的策略手段。

宋慶齡最瞭解個中內情。她在與孫中山一起為此而工作時，表示理解孫中山的做法。她在後來回答斯諾提問孫中山是否相信共產主義時說：「噢，相信的！不過，開頭不相信。他曾認為我們的革命應該走一條和俄國不同的道路。一九二三年以後，他認為我們可以走同一條道路。」

這裡講的「開頭不相信」，從一九二二年孫中山與達林談話中可以略知一二。孫中山起先認為文化落後的民族容易接受共產主義。他對達林說：「我給你一個山區，一個最荒涼的沒有被現代文明所教化的縣。那兒住著苗族人。他們比我們的城裡人更能接受共產主義，因為在城裡，現代文明使城裡人成了共產主義的反對者。你們就在這個縣組織蘇維埃政權吧，如果你們的經驗是成功的，那麼我一定在全國實行這個制度。」⁹⁷

但是，當孫中山瞭解到俄國這樣的大國成功地實行了蘇維埃制度時，他就沒有理由不相信了。然而這時候，又如他對達林談話時指出的，由於國民黨內及廣州政府內外存在著很大的反蘇反共產主義的勢力，他們一直指責孫中山和蘇聯的關係，朋友對孫中山也有誤解（包括支持他的華僑），說「他將要公開推行已經秘密實行多年的共產主義政策」。⁹⁸所以，他必須非常謹慎地處理這個特別敏感的問題。

關於這一點，宋慶齡在回答斯諾的問話時就講得十分清楚：孫中山「講話內容完全是根據政治局勢和聽眾而定……對那些他需要從他們那裡得到說明的人們，他說得很謹慎，而他的著作也是經過編輯的，以免他的追隨者鬧分裂。我們辦事必須慎之又慎，他常常告誡我說：『要按中國人的方式辦事——兜圈子——不能徑直沖向目標』」。⁹⁹

孫中山的做法顯然是對的。他懂得政治鬥爭是怎麼一回事，以及怎樣進行這種鬥爭。所以有人評論說：「這份與越飛聯名發表的宣言獲得了先發制人的效果。孫中山開誠佈公地闡明了自己的觀點，從而證明，他遠非某些人所指責的那樣是個極左分子。」¹⁰⁰

實際上，當時在中國民眾中馬克思主義理論水準普遍很低的歷史條件下，還沒有一個人能說清楚未來的共產主義社會到底是什麼樣子，也無力來批駁所謂「共產共妻」之類的謠言。

98 [美] 艾蜜莉·哈恩：《宋氏家族——父女·婚姻·家庭》第一百二十九頁，香港一九四一年英文版。

99 [美] 埃德加·斯諾：《復始之旅》第一百〇九、一百一十頁，新華出版社一九八四年版。

100 [美] 艾蜜莉·哈恩：《宋氏家族——父女·婚姻·家庭》第一百二十九頁，香港一九四一年英文版。

如果把這個遙遠的目標和許多人還不可理解的「幽靈」請出來干擾當前的鬥爭，那是很不明智的，孫中山決不會這樣幹。

正如宋慶齡介紹的，孫中山對共產主義的認識，有一個過程；轉向蘇聯，也有一個過程。斯諾又問：「轉向俄國是他最後一個機會了吧！」宋慶齡答：「你不如說這是他最後的選擇。」因為西方各國在一一拒絕了孫中山請求援助的呼籲之後，「俄國是第一個平等對待中國的強國」。¹⁰¹

宋慶齡所以如此瞭解內情，不僅因為她完全瞭解孫中山，理解孫中山，贊同孫中山，而且積極支持孫中山的立場和行動。她不是消極被動地追隨，而是積極地促進事態的發展。她不僅經常陪同孫中山會見來自蘇聯的代表，而且做了大量切實有效的工作，會談前的準備和事後的聯絡，都由她親自執行。這些工作往往比會談本身更複雜、工作量更大。在這個過程中，她與列寧派來的代表保持密切的聯繫，認真地聽取他們的意見，及時地報告給孫中山。正是通過這些活動，宋慶齡對俄國革命和中國革命有了更多的瞭解，為她此後堅持孫中山的三大政策奠定了思想基礎。

二、支持五四運動

一九一九年發生在北京並波及全國的五四愛國運動，以徹底的反帝反封建的姿態，給予帝國主義和北洋政府以沉重的打擊，粉碎了他們在巴黎和會上出賣中國主權的陰謀。這是孫中山幾十年奮鬥都未曾獲得的成就。孫中山從這一運動中得到很大的啟示，看到了在自己依靠的海外華僑以外一個更加強大的力量，看到了自己所藉助的軍閥勢力之外，真正革命的力量——工農民眾的力量，民眾大聯合的力量，而俄國革命的勝利正是依靠了這支力量，這是革命的主力軍。

北京青年學生五月四日集會遊行與軍警搏鬥的消息傳到上海後，孫中山和宋慶齡都很興奮。他們滿腔熱忱地歡迎和支持學生愛國行動，對北洋政府無理逮捕愛國學生表示極大的憤慨，並由宋慶齡代孫中山起草了「學生無罪」的援救電。¹⁰²

孫中山和宋慶齡極大地關注上海學生的愛國行動，積極支持他們的正義鬥爭。上海學生回應北京學生舉行示威遊行時，孫中山於五月二十六日約請上海學生聯合會主席、新加坡歸國華僑學生何葆仁在西藏路老金龍西餐館敘談，熱情地鼓勵他說：「你們學生這種愛國行動很好，」並建議，「要喚起民眾，與各界聯合起來。」後來，上海學生再次遊行，打算衝進租界，直接向帝國主義示威。但顧慮到租界規定不准遊行集會，否則外國巡捕可以肆意抓人；

102 許德珩：《宋慶齡無愧為國家名譽主席》，載《文匯報》一九八一年五月二十二日。

審判時，根據領事裁判權，中國律師又不准出庭。他們正為難時，孫中山和宋慶齡替學聯聘請了幾位英、法籍的律師，準備隨時出庭為學生辯護，作他們行動的後盾，¹⁰³學生得訊後十分激動。五月三十一日，他們破天荒第一次在租界內公開舉行反帝愛國大示威，產生了很大的影響，大長了中國人民的志氣，大滅了帝國主義的威風。事後，六月二日，何葆仁和另一學生領袖朱仲華代表學聯到莫里哀路寓所，向孫中山和宋慶齡彙報，並感謝他們對學生的支持。孫中山和宋慶齡熱情讚揚上海學生的鬥爭精神，肯定了學生們的行動是「很了不起的勝利」。

當時，北京及全國各地的學生代表，紛紛奔赴上海進行聯絡，尋求支援，孫中山專門派出一位留學比利時的學生黃大偉負責同他們聯繫，¹⁰⁴對要求接見者，孫中山都給予熱情接待。他時而語重心長地親切教誨：「中國的將來，中國的命運，這些重大的責任，完全落在你們這一代青年的身上。你們要學科學，要愛國。」¹⁰⁵時而平等地與他們一起討論國家大事。在這種情況下，宋慶齡總是靜靜地在一旁諦聽著，並把一些重要的談話內容用打字機記錄下來。不論是孫中山會見蘇聯代表，或者學生代表，她總是這樣。她知道自己所處的位置，知道這些代表只是想拜見和請教孫中山，她知道怎樣才是對孫中山最好的幫助，從不表現自己，做出「夫人干政」的事情來。宋慶齡這種高尚的情操，贏得了人們的普遍尊敬。當時北京大學

103 朱仲華：《難忘的歲月——「五四」運動在上海雜憶》（李國平整理），載《復旦大學校史通訊》，一九八五年第八期。

104 常宗會：《一九一九年在上海兩次見到孫中山先生》，載《江蘇文史資料選輯》第七輯。

105 同上。

學生代表許德珩，回憶自己與學聯代表參加這樣的一次討論後的心情時說：「歸途中，大家邊走邊議論，都認為她並沒有以中山先生夫人的身分參加我們的討論，這種穩重謙虛的風度，令人敬佩，讚歎不已。」¹⁰⁶

宋慶齡後來這樣回憶孫中山和她接見青年學生時的情況，以及他們對青年寄予的深情：

「孫中山經常瞭解到中國革命的成功必須依靠青年的熱情和支持。甚至在他最忙碌的日子裡，他也從不拒絕那成群跑來找他談話的男女青年們。他時常不得不請那些事務繁忙的人等候幾小時或幾天——但從來不讓青年學生或那些年輕、熱情而純樸的工人和農民等候他。對於這些人，他的門永遠是敞開著的。如果有人抗議說：青年們年輕，有時間等待。他就會回答說：國民黨的主義只有中國青年才能完成；老的領導者們隨著年月的消逝，有的死了，有的動搖了；只有青年們才是堅決的，能克服一切的。」¹⁰⁷

為表示對學生運動的支持，孫中山還到上海大馬路先施公司的屋頂花園參加全國學聯總會的閉幕會，他發表演說，與學生們一起照相。此外，孫中山和宋慶齡還積極幫助學生解決一些實際困難，做了不少實際工作，如曾幫助安徽學生代表常宗會辦理赴法勤工儉學的手續等。¹⁰⁸

五四運動波及廣州，在廣東大中學校學生聯合會的領導下，廣州市各校學生群眾立即回

106 許德珩：《高風亮節、大義凜然——記宋慶齡同志》，載《光明日報》一九八一年五月二十三日。

107 宋慶齡：《青年與革命》，載《宋慶齡選集》第三十九、四十頁，人民出版社一九六六年版。

108 常宗會：《一九一九年在上海初次見到孫中山先生》，載《江蘇文史資料選輯》第七輯。

應，開展了一系列遊行、示威、集會、抗議活動，其中搞得最激烈的是抵制日貨的活動。學生們組織了檢查隊，逐街逐店檢查日貨。工人也參加了鬥爭。廣東督軍莫新榮派出軍警進行鎮壓，工人及學生代表黃風廷、胡定科等被逮捕，並有學生多人被毆打致傷，甚至因傷重而致死者。宋慶齡知道後極為氣憤。她根據孫中山的授意，起草致廣東軍政府的電報，責問說：

「方今文明各國，不聞有壓抑民意之政府。我粵為護法政府所在地，豈有此等舉動？」
要他們立即釋放被捕學生，並警告他們：「民氣以愈激而愈烈，若專恃威力，橫事摧殘，不惟為粵人之所公憤，亦即全國之所不容也。」
109

這裡，「方今文明各國，不聞有壓抑民意之政府」這句話，反映了宋慶齡和孫中山對西方文明浪漫的看法，帶有片面性。宋慶齡在若干年以後，特別是目睹過解放戰爭時期美國對中國的侵略和美軍在華所犯下的種種暴行以後，她決不會再寫出這樣的文字。這說明宋慶齡的政治思想有一個發展的歷史過程。不過，這個電報的主要精神是表明孫中山和宋慶齡對民眾力量、「民氣」的重視。

從此以後，他們一直支持學生的革命行動，並在學生中發展國民黨的組織。一九二三年初，北洋政府委派不學無術的政客彭允彝出任教育總長，引起廣大師生的極大憤慨，由此展開了一場直接針對軍閥政府的驅彭鬥爭。北大校長蔡元培在軍閥勢力壓迫下辭去校長職務。北京學生推派王昆侖、黃日葵等四人為代表，到上海進行聯絡，尋求各界的支援。當他們要求會見孫中山時，宋慶齡陪同孫中山在寓所親切地接見了他們。孫中山教導他們說：「彭允彝的問題，不只是教育界的問題，而是一個政治問題。光反對彭允彝一人很不夠，要反對他的主子曹錕、吳佩孚，還要反對曹、吳的後臺老闖帝國主義列強。你們的鬥爭，也不是北京一個地方的事，而是全國人民的鬥爭。」¹¹⁰幾天之後，孫中山就介紹王昆侖到國民黨機關履行參加國民黨的手續，此後王昆侖就在北京學生中聯絡同志，進行革命工作。

同年十二月二十一日，宋慶齡陪同孫中山到廣州嶺南大學同學生們會見。孫中山在該校所作的演說中，勉勵學生們要立志「做大事，不可要做大官」，「把中華民國重新建設起來，讓將來民國文明，和各國並駕齊驅」。¹¹¹

110 王昆侖：《宋慶齡——畢生為新中國奮鬥的忠誠戰士》，載《人民日報》一九八一年六月三日。

111 《在廣州嶺南學生歡迎會的演說》，載《孫中山全集》第八卷，第五百三十三至五百四十二頁，中華書局一九八六年五月版。

三、輔助改組國民黨

以俄為師，依靠工農，最後歸結到國民黨改組，與共產黨合作。

中國共產黨成立後，首先在本階級內部進行工作，大力開展工人運動，掀起了中國第一次工人運動高潮，顯示了工人階級偉大的力量。但是，由於共產黨領導人理論準備的不足，對中國國情也缺乏深刻的瞭解，以為中國可以直接進行十月革命式的社會主義革命，建立無產階級專政。因此黨的活動局限在工人運動中，對國民黨這一資產階級政黨拒之千里。

在列寧和共產國際的幫助下，中國共產黨在一九二二年七月的「二大」上才明確中國當前只能進行反帝反封建的民主革命，制定了與國民黨等民主派共同建立一個民主主義的聯合戰線的方針，決定與國民黨合作。

最早最積極推動這個合作的共產黨人是李大釗。他早在一九一九年就與孫中山接觸。因此宋慶齡與李大釗也有密切的聯繫。李大釗是我國第一個認真、系統地學習馬克思主義並把它和俄國革命經驗介紹到中國的人。正是在一九一八至一九一九年，李大釗在《新青年》等刊物上發表了《布爾什維克的勝利》、《我的馬克思主義觀》和《法俄革命之比較觀》等重要文章，使正在總結歷史經驗、探求革命新出路的孫中山很受啟發。宋慶齡回憶，孫中山在與李大釗等人接觸中，「看到人們孜孜不倦地研究馬克思主義和列寧的著作，感到非常高興。孫中山特別欽佩和尊敬李大釗。這種情緒也感染了宋慶齡。『我們總是歡迎他到我們家來……』」孫中山在見到這樣的客人後常常說，他認為這些人是他的真正的革命同志。他知道，在鬥爭

中他能依靠他們的明確的思想和無畏的勇氣」。¹¹²

一九二二年八月下旬，正是陳炯明背叛孫中山而去的時候，李大釗來到孫中山的身邊。李大釗根據中共「二大」精神，與已經加入共產黨的老同盟會員林伯渠一起，同孫中山進行了多次交談，討論「振興國民黨以振興中國的種種問題」。孫中山對這種真誠的幫助感到非常高興，和李大釗「暢談不倦，幾乎忘食」。¹¹³在此期間，蘇俄政府的特使越飛來華。經過李大釗、林伯渠的介紹，孫中山與越飛進行了六天的會談，進一步商討了以俄為師、改組國民黨與建軍，以及蘇聯援助中國革命等問題。宋慶齡參加了這些會談，並為安排會談做了許多工作。

就這樣，在中國共產黨的幫助下，孫中山開始迅速轉變，國民黨改組和國共合作開始了實質性的工作。一九二二年九月四日，孫中山在上海召開了改組國民黨的會議，正式決定改組國民黨，接著指定包含有共產黨人的九人組成「改進案起草委員會」。一九二三年元旦，孫中山發表了《中國國民黨宣言》，強調今後革命必須依靠民眾力量。從依靠少數地方軍閥到依靠廣大民眾，這是孫中山的革命思想發展的一個飛躍，這是和共產黨人對他的幫助與影響分不開的。

轉折時期，出現了許多新事物和新問題。宋慶齡知道自己年輕，閱歷淺，就特別注意學

112 宋慶齡：《孫中山和他同中國共產黨的合作》，《人民日報》一九六二年十一月十二日。

113 參見李大釗：《獄中自述》。

習和思考，力求跟上孫中山的前進步伐。在一九二四年一月上旬，國民黨內有些人竭力反對共產黨員加入國民黨時，宋慶齡請教孫中山：為什麼需要共產黨加入國民黨？孫中山回答說：「國民黨正在墮落中死亡，因此要救活它就需要新血液。」他所說的「墮落」，指的是國民黨黨員缺乏革命精神、士氣和勇氣，忘記了建立國民黨的目的是為了革命，因此產生了個人利益開始支配黨員行動這種不幸的後果。孫中山還多次對宋慶齡說：「國民黨裡有中國最優秀的人，也有最卑鄙的人，最優秀的人為了黨的理想與目的而參加黨，最卑鄙的人為了黨是升官的踏腳石而加入我們這一邊。假如我們不能清除這些寄生蟲，國民黨又有什麼用處呢？」¹¹⁴正是通過孫中山革命思想的薰陶，宋慶齡進一步瞭解了改組國民黨的真諦。

後來，看到孫中山的新政策初步顯示威力時，宋慶齡深受感動，更加由衷地全力擁護。她曾回憶說：「我清楚地記得一九二四年七月廣東全省第一次農民大會在廣州開會。這是我們第一次看見必然成為中國新力量的中國人民來參加革命。這些農民來自廣東各縣，許多人赤著腳走了好些里路來到廣州。他們衣衫襤褸，有的還帶著籬筐和扁擔。我深深地受了感動。」；「孫中山也很受感動。我們回到家裡之後，他對我說：『這是革命成功的起點』，並且又告訴我中國被壓迫的人民在自救中所必須起的作用。」¹¹⁵

由於宋慶齡深刻地理解了這些道理，從而堅定不移地去維護孫中山的革命理想，維護革

114 宋慶齡：《儒教與現代中國》，載《宋慶齡選集》第一百〇九頁，人民出版社一九六六年版。

115 宋慶齡：《為抗議違反孫中山的革命原則和政策的聲明》，載《宋慶齡選集》第二十一頁，人民出版社一九六六年版。

命的利益，向一切反動的勢力進行鬥爭。當孫中山明確表示改組國民黨和聯俄、容共、扶助農工的意向後，立即遭到國民黨內一些代表大地主大資產階級的右翼代表人物的強烈反對。孫中山對此採取了毫不妥協的態度，他親筆寫文章駁斥他們的謬論，指出國民黨改組和容共的必要，並發表了《致全體黨員書》，詳細解釋聯俄容共的必要性和重要意義，嚴肅批評那些散佈謠言的人，「不是出於敵人破壞的行為，就是屬於毫無意識的疑慮」。¹¹⁶這些人在陰謀無法得逞時，誤以為宋慶齡年輕可欺，就來拉攏她，企圖通過她去影響孫中山的革命行動。宋慶齡深信孫中山所說的「共產黨人是我的真正的革命同志」，所以毫不動搖，並立即義正詞嚴地拒絕了他們，保衛了孫中山的革命路線。後來她追憶這段歷史說：「國民黨右派不滿意孫中山傾向於社會主義和刷新三民主義的做法。他們十分厭惡他的三大政策。特別是『扶助農工』這一條，他們認為這一條是對他們利益的威脅。在這種合作中，像在其他革命工作中一樣，每當孫中山要向前跨一步的時候，就有許多人企圖把他拉回來。一聽到宣佈他決定實現這種統一戰線，有些人就來找我，以為我會幫助他們反對這一行動。當我拒絕這樣做、孫中山堅決做下去的時候，這些人就退黨，並且公開攻擊他。可是孫中山是嚇不倒的。」¹¹⁷

孫中山在改組國民黨和國共合作問題上，態度鮮明，堅持原則，即使對兒子孫科也毫不容情。國民黨「一大」前夕，孫科追隨右派分子發表了反蘇反共的言論，不贊成國民黨改組。

116 上海《民國日報》一九二四年三月十六日。

117 宋慶齡：《孫中山和他同中國共產黨的合作》，載《人民日報》一九六二年十一月十二日。

孫中山得知後，便將孫科的名字從第一屆國民黨中央委員會委員名單中勾掉。他說：「把這個名額留給真正贊成改組的同志。」¹¹⁸這件事，給予宋慶齡很大的啟發和教育，認識到自己對孫科也應該採取同樣的原則。孫科是一個政治上動搖而往往偏右的政客。蔣介石叛變革命初期，孫科曾公開譴責蔣介石「篡位」，「敗壞了國民黨」；在蔣介石統治下，「所有的地方政府、省、市政府都已腐敗透頂」等等，並嘲諷蔣介石宣稱其為孫中山「選定的接班人」是彌天謊言。但是，他後來又投靠蔣介石，跑到南京政府裡去擔任要職。宋慶齡對孫科的前者表示支持，對後者則不惜採取決裂的態度，毫不含糊。

一九二四年一月下旬，中國國民黨第一次全國代表大會，在廣州國立高等師範學校（後改名中山大學）舉行。在代表大會上，通過了《中國國民黨第一次代表大會宣言》、《中國國民黨章程》等重要議案，選舉出包括共產黨人李大釗、毛澤東、瞿秋白、林祖涵等人在內的中央委員會，確立了聯俄、容共、扶助農工三大革命政策，承認共產黨員和社會主義青年團員以個人資格加入國民黨，從而實現了國民黨的改組，標誌著國共第一次合作的正式建立。當時，長期擔任孫中山秘書工作的年輕國民黨員宋慶齡，雖然沒有以代表身分參加大會，但她是這次大會通過的宣言和孫中山宣導的「新三民主義」的積極支持者，並為大會的召開做了許多具體工作。

毛澤東對於孫中山的這一偉大行動給予極高的評價。他讚譽孫中山重新解釋的「三民主義」是「革命的三民主義、新三民主義、真三民主義，是新民主主義的三民主義，是舊三民主義的發展，是孫中山的大功勞」。由此，「建立了三民主義同共產主義的統一戰線，建立了第一次國共合作，取得了全國人民的同情，舉行了一九二四年至一九二七年的革命」。¹¹⁹

宋慶齡在孫中山實現這一偉大行動的過程中，始終同孫中山脈搏相通，心聲與共，殫精竭慮地積極輔助改組國民黨的工作。所以，毛澤東對孫中山晚年給予的極高評價裡，其中也有宋慶齡的功勞。

四、參加廣東革命根據地的建設

在幫助孫中山改組國民黨、聯合共產黨的同時，宋慶齡積極參加了廣東革命根據地的建設工作。改組與合作是為了國民革命，而國民革命是離不開鞏固的根據地和堅強的武裝的。

一九二三年初，孫中山發出通電討伐陳炯明，命令所組織的滇、桂聯軍奮勇殺敵，「為國家除叛逆，為廣東去兇殘」，重建廣東革命根據地。由於粵軍內部的起義回應，陳家軍土崩瓦解，迅速潰敗。同年二月，孫中山又從上海回到廣州，第三次在廣州建立政權，重新成立了大元帥府。但打著革命旗幟的滇、桂軍盤踞廣州，飛揚跋扈，討餉索彈，爭權奪利，根本不

聽指揮；而且他們在北洋軍閥的收買分化下，紛紛叛變，一度威脅到廣東政權。孫中山為挽救危局，就親自奔赴前線指揮戰鬥，並到醫院慰問受傷官兵。

宋慶齡就在這種危急的時候，從上海來到廣州士敏土廠大元帥府的孫中山身邊，並立即投身於

緊張的勞軍活動中。她從五月一日起，不顧勞累和艱險，連續八九天，到廣州各傷兵醫院及前線各地慰問傷兵。其中，五月一日偕同何香凝等人，到廣州市內市立、陸軍、博洛等醫院慰問傷兵，分贈物品；¹²⁰四日，她獨自赴廣州各醫院慰問傷兵；¹²¹六日陪同孫中山等人，乘坐輪船、電船赴西江到石圍塘滇軍臨時病院慰問，並與孫中山分別犒賞傷兵每人十元和一元。接著，又乘廣三鐵路火車至三水縣後，與孫中山一起步行長距離的「崎嶇泥濘之路」，到達河口大本營野戰醫院、兵站第二病院以及三水城內醫院裡慰問傷兵，分贈餅乾、牛奶等物，又與孫中山分別犒賞傷兵每人十



孫中山與宋慶齡，一九二三年攝於廣州。

120 上海《民國日報》一九二三年五月四、十日。

121 同上報，一九二三年五月五日。

元和一元；¹²²八日，得知黎洞連江口及英德等處的戰鬥很激烈，血肉相拼，死傷甚重，又立即陪同孫中山攜帶現銀數萬元，乘坐粵漢路專車到英德及連江口慰問前敵將士。¹²³

此外，宋慶齡還陪同孫中山巡視重要的軍務單位，所到之處她受到官兵們廣泛的歡迎。如同年十月十一日，視察了廣州飛機製造廠；二十一日至二十三日，又乘「江固」號炮艦赴虎門要塞巡視各炮臺，在虎門要塞司令廖湘雲導引下接見了炮臺的全體官兵，並檢閱了官兵的操練，等等。

宋慶齡的這些活動，給予孫中山很大的支持和安慰，支援了討伐叛逆的戰爭，鼓舞了士氣，也使廣大傷病員和官兵深受

122 上海《民國日報》一九二三年五月十三日。
123 同上。



一九二四年元旦，孫中山、宋慶齡在廣州。

感動，紛紛表示要更加英勇地殺敵立功，報效民國。¹²⁴

一九二四年元旦，宋慶齡陪同孫中山出席在廣州大元帥府舉行的慶祝元旦和民國政府成立紀念儀式，隨後又舉行頒獎大會，給陳炯明叛亂時防守觀音山的衛士頒發獎牌。在孫中山講話後，宋慶齡親自將獎牌給戰鬥的有功衛士佩戴。當時，會場「場面嚴肅和穆，誠自民國以來空前之盛典」。¹²⁵獎章呈圓形，中鑄大元帥孫中山像，像頂青天白日國徽，伴以嘉禾，上端刻「中華民國海陸軍大元帥」，下刻「十一年討賊有功獎章」。

在宋慶齡支持孫中山革命事業的眾多事蹟中，乘坐「洛士文」號飛機試飛，是非常生動的一例。

孫中山素有「航空救國」的主張，並有一貫重視和依靠愛國華僑辦航空的想法。一九一七年，他曾派楊仙逸去美國購買飛機，到一九二〇年十一月時，又在廣州成立了航空局，從維修進口飛機進而著手建廠自造飛機。在孫中山親自關懷、督促下，中國辛亥革命後的第一架飛機終於在一九二三年六月裝配成功。為了紀念孫中山和宋慶齡的領導和贊助，這架飛機就以宋慶齡的英文學名 Rosamonde 的譯音「洛士文」命名為「洛士文」號。

七月上旬，在飛機問世不久後的一天，宋慶齡陪同孫中山來到廣州郊區大沙頭飛機場主持「洛士文」號命名試飛典禮。當時，世界的航空事業還處於初創階段，這架中國人自己製

124 上海《民國日報》一九二三年五月四、十日。

125 廣州《民國日報》一九二四年一月三日。

造的飛機能否飛起來？能否平穩地在天空飛行？能否安全降落？都是大家擔心和懷疑的問題。因此，當孫中山環顧左右文武官員，探詢誰願意參加試飛當第一乘客時，大家都面面相覷，沒有一個人回答。這時，宋慶齡挺身而出，大家都感到意外，這有多大的危險啊！但宋慶齡好像完全沒有想到什麼危險。她泰然自若地微笑著從人群中走出來，邁著堅定、輕捷的步子，走向機艙，機艙裡只有兩個座位，一個飛行員黃光銳坐，另一個就是她坐。

試飛順利。飛機升上晴空後，在空中旋轉自如，靈活精巧，安詳而平穩；一會兒，又在空中作了特技表演，在廣州上空轉了幾圈才徐徐降落。當宋慶齡從容地走出機艙時，孫中山和文武官員像歡迎凱旋的英雄一樣，一齊擁上前去祝賀，讚揚飛機性能之良好，佩服飛行員技術之高超，更欽佩宋慶齡的勇敢行動。¹²⁶

對於宋慶齡來說，這一壯舉是她獻給孫中山的一份珍貴的禮物，一顆以實際行動支持孫中山革命事業的赤誠之心。

宋慶齡表面上看來文靜纖弱，實際上卻具有大無畏的革命精神。她的一生中，有無數類似「洛士文」號試飛這樣蔑視困難和危險的傳奇故事。一九二六年，她還曾自告奮勇搭乘一架容克飛機從廣州飛往武漢，而當時國民政府其他部長們都對飛機望而生畏，誰也不敢乘坐。¹²⁷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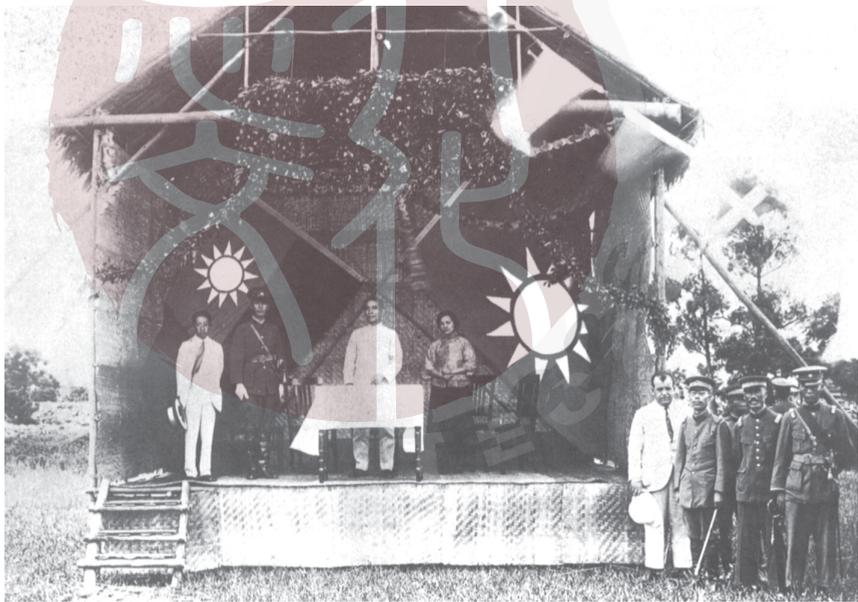
在蘇聯和中國共產黨的幫助下，孫中山在廣州創辦了中國國民黨陸軍軍官學校（因校址

126 參見羅敏：《宋慶齡與「洛士文」號飛機》，載《新觀察》一九八二年第十期。

127 參見陳丕士：《回憶宋慶齡》，載香港《大公報》一九八一年六月七日。

在黃埔島，一般稱為黃埔軍校）。

一九二四年六月十六日，黃埔軍校開學，宋慶齡陪同孫中山到校參加盛典，給予師生很大的鼓舞。當時參加開學典禮的季方回憶說：「慶齡同志當時很年輕，態度慈祥，儀錶端莊，令人肅然起敬」；而她在國民黨改組中所起的作用更令人敬仰，「大家都知道她不僅是中山先生的愛侶，而且擔負著機要秘書工作，為中山先生整理檔、函電，提供資料，一方面深受中山先生革命精神的影響，另一方面又幫助中山先生革命思想的發展，對改組國民黨制訂三大政策，實行革命的三民主義，都起到了積極的輔助作用，



孫中山接受共產國際和中國共產黨的建議，「創造革命軍，將來挽救中國的危亡」。這是一九二四年六月一六日在黃埔軍校的開學典禮上。右起：宋慶齡、孫中山、蔣介石、廖仲愷。

是一位得力的助手」。¹²⁸

綜上所述，可以充分說明，一九二二至一九二四年這三年中，宋慶齡在輔助孫中山改組國民黨，確立聯俄、容共、扶助農工三大政策，協助建設革命武裝和廣東革命根據地方面，都是嘔心瀝血、全力以赴的。她為推動國共第一次合作，為中國革命事業的發展，做出了重要的貢獻，從而也使她開始成為世界矚目的人物。當時一位元國際新聞社的記者埃德娜·李·布克訪問孫中山和宋慶齡後，對宋慶齡這樣寫道：「當她與他（孫先生）談話時，閃亮的眼睛中充滿著仰慕之情，神態羞赧、溫柔而又崇敬。人們告訴我，孫夫人是可愛的，但是我未想到她是那樣容光煥發，那樣高雅優美，她的理想又是那麼熾烈！這位像花一樣的婦人，穿著精緻的藍色長袍，是那麼文雅、富於魅力、儀態端莊，很難想像是一位革命領導者。然而，她已獻身於自己的丈夫，……獻身於他為之奮鬥的革命事業。」¹²⁹

可以毫不誇張地說，這幾年是孫中山革命歷程中最輝煌的年代，對於宋慶齡來說，也是她嶄露頭角的年代。

可是，昊天不吊，哲人其萎，正在中國革命走向新的高潮時，孫中山突然病倒繼而逝世了。宋慶齡又面臨一個嚴峻的考驗。

128 季方：《宋慶齡同志是中華民族的一代楷模》，載《光明日報》一九八一年六月一日。

129 轉自〔美〕羅比·尤恩森：《宋氏三姐妹——宋藹齡、宋慶齡、宋美齡》第六十八頁，世界知識出版社一九八四年版。